

# 政治哲学终结了吗？

汉娜·阿伦特 VS 列奥·施特劳斯

[法] 卡罗勒·维德马耶尔 著

Carole Widmaier

杨嘉彦 译



**Fin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Hannah Arendt contre Leo Strau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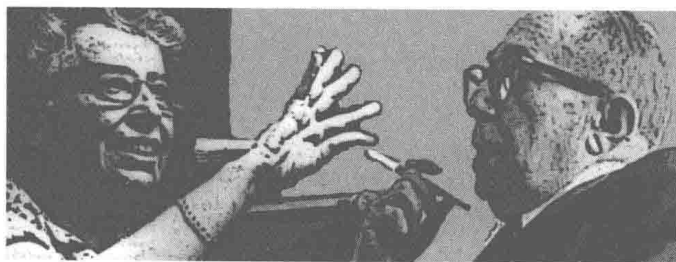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政治哲学终结了吗？

汉娜·阿伦特 VS 列奥·施特劳斯

## Fin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Hannah Arendt contre Leo Strauss



[法] 卡罗勒·维德马耶尔 (Carole Widmaier) 著

杨嘉彦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哲学终结了吗 / (法) 卡罗勒·维德马耶尔著; 杨嘉彦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675-4165-8

I. ①政… II. ①卡… ②杨…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7995 号



### Fin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By Carole Widmaier

Copyright © Fin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CNRS Editions, Paris, 201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NRS EDITIO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3-353 号

## 政治哲学终结了吗

著 者 (法) 卡罗勒·维德马耶尔

译 者 杨嘉彦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何 旸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165-8/B.977

定 价 6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目 录

阿伦特与施特劳斯：一种比较的尝试(译序) .....	1
中文版序 .....	22
导论 .....	26

## 第一部分 关于危机的交错目光

第一章 施特劳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评者 .....	37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	42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	52
思想的高尚 .....	62
第二章 汉娜·阿伦特:照亮危机的事件 .....	70
极权主义的考验 .....	70
处于危机中的教育 .....	77
现象性和常识 .....	86
权威和传统 .....	96
思想的危机,现实的危机 .....	118

## 第二部分 现代性和传统

第三章 施特劳斯：作为屏障的传统 .....	123
现代虚无主义 .....	123
真理的意图 .....	139
为哲学辩护 .....	148
第四章 阿伦特：传统作为诸多概念的镂空 .....	152
哲学的开端与终结 .....	153
传统的报复：对意义的阻碍 .....	162
意义的责任 .....	181
第五章 施特劳斯：回到政治哲学的起源 .....	189
马基雅维利或最高思想的现代式放弃 .....	189
回到亚里士多德 .....	193
第六章 阿伦特：为意义寻找资源 .....	198
奥古斯丁与诞生性条件 .....	200
康德与多样性的条件 .....	211

## 第三部分 思考政治

第七章 从科学到前科学 .....	221
第八章 思想作为一种质疑的力量 .....	236
第九章 自然和哲学——条件和现象学 .....	256
第十章 判断和自由 .....	270
第十一章 远离世界还是栖居在其中？ .....	276
结论 .....	283
选择性的参考书目 .....	294
译后记 .....	313

## 阿伦特与施特劳斯：一种比较的尝试(译序)

卡尔·洛维特：“又及：阿伦特关于政治哲学的作品是否值得一读？”

列奥·施特劳斯：“我没有读过她关于政治哲学的文章。”<sup>[1]</sup>

阿伦特：“施特劳斯：……一位十足的原教旨无神论者。非常古怪。他具有真正的智慧。我不喜欢他。他应该有五十多岁了。”<sup>[2]</sup>

### 一

对于施特劳斯与阿伦特这两位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在思想上毫无交流且在文本上也没有互相引用或批判的思想家来说，把他们放在一起讨论难免会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甚至他们的可比性（comparabilité）都会遭到质疑。显然，本书的作者卡罗勒·维德马耶尔（Carole Widmaier）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交锋”（confrontation）：在同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面前，把两个思想家各自的主张和论证进行交换，从而形成一个对话空间，但是对话的双方全都没有在场，这种对话在现实中也不曾发生。由这样的比较出发，我们也能重新勾勒出阿伦特与施特劳斯各自所经营的思想体系。就是

---

[1] 洛维特与施特劳斯分别在1962年3月27日与1962年4月2日的通信，引自《城邦》（*Cité*）杂志，Paris，PUF，第8期，2001年。

[2] 引自阿伦特在1954年7月24日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见 *Correspondance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1926-1969*, Paris, Payot, 1996。

这种被展开的对话(*faire dialoguer*)的巧妙方法也使我们很好奇这位施特劳斯与阿伦特的法国阅读者的研究经历。

维德马耶尔女士 1996 年通过巴黎高师(乌尔姆)的预科班考试,以第七名的成绩成为高师生(*normalienne*),在巴黎高师学习期间她成功通过了高中哲学教师资格证的考试(*agrégation*)。她师从保罗·利科的学生玛丽亚姆·勒沃·达洛纳(Myriam REVAULT D'ALLONNES)教授,并以讨论阿伦特思想中“爱”这一主题的论文拿到硕士学位(DEA)。从 2000 年开始到 2008 年博士论文答辩之前,她一直作为助教工作于鲁昂大学哲学系以及不同的高中。她本人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关于施特劳斯和阿伦特的论文,而她第一次接触这两位思想家的著作则是在高中的哲学课上。2009 年至今,她担任法国弗朗什-孔岱大学(*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哲学系讲师。本书即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这部著作有着极强的法国哲学教育背景,行文中的许多论述,许多思想的迁移与类比,都体现着法国哲学的传统。

这本书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做一个阿伦特与施特劳斯思想的系统研究,更不是要将二人的思想分一个高下,作者的最初意图是要思考如何能在现时代的危机中还能够维护理性的尊严,哲学在现实政治的环境下还是否具有可能性,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应该是如何的。诚然,作者并没有将 20 世纪所有思想家对危机、现代性的讨论做一总结,而是选取了在同一时代中同在德国出生,同是犹太人,日后同在美国教书的阿伦特(1906—1975)与施特劳斯(1899—1973),讨论从他们的思想中所表现出的直面危机的两种主张(*propos*),虽然不是解决方案(*solution*),但是他们对传统价值的维护,对传统权威概念消失的遗憾,从古人中进行借鉴的态度,都让作者找到了将这二人思想进行比较的理由。本书所讨论的两位主角阿伦特与施特劳斯,

在 1932 年就已经认识<sup>[1]</sup>，但是他们彼此并不互相承认，起因在于阿伦特反感施特劳斯犹太复国主义的保守姿态，自此二人在学术活动中再无交集<sup>[2]</sup>。他们无论是在生平还是在学术上都有很多的相似点，而每个相似点背后却又有更大的差异：早年他们都受教于海德格尔<sup>[3]</sup>，阿伦特一生都带着海德格尔思想的烙印，而从对施特劳斯在 30 年代所写文章的研究来看，他个人哲学思想的奠基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sup>[4]</sup>；他们虽都是德国裔犹太人，但是阿伦特并无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甚至对它的极端性感到厌恶<sup>[5]</sup>，而施特劳斯对于犹太教的当下复兴非常热衷<sup>[6]</sup>；他们最主要的学术活动都是在美国进

---

[1]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Biographie*, trad. par Joel Roaman et Etienne Tassin, Paris, Calmann-Lévy, p. 125.

[2] 值得一提的是，施特劳斯与阿伦特在六十年代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阿伦特在 1963 年 11 月 24 日给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就对施特劳斯没有在 30 年代初预见纳粹的上台提出批评，而且她也指出施特劳斯正在“积极活动”来反对她所写的艾希曼一书，见 *Correspondance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1926-1969*, Paris, Payot, 1996。

[3] 施特劳斯在博士期间曾先后听了马克思·韦伯、海德格尔以及雅格（Werner Jaeger）的课，他对海德格尔的佩服与崇拜远超过另两位，见 Leo Strauss, “Introduction à l’existentialisme de Heidegger”，载 *La renaissance du rationalisme politique classique*, trad. par Pierre Guglielmina, Paris, Gallimard, 1993, 第 94 页。

[4] 见 Heinrich Meier, “How Strauss became Strauss”，载 *Reorientation: Leo Strauss in 1930s*,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第 13-32 页, Corine Pelluchon, *Leo Strauss: Une autre raison, d’autres Lumières*, Paris, Vrin, 2005, 第 52-58 页。

[5] 见阿伦特于 1941 年到 1961 年的名为 *Auschwitz et Jérusalem* 的文集（Paris, Tierce, 1991），其中 1944 年 10 月所写“Réexamen du sionisme”一文最具代表性。

[6] 施特劳斯对犹太教的观点，见他于肖勒姆（G. Scholem）的通信集，*Cabale et philosophie: correspondance 1933-1973*, Paris, Editions de l’écart, 2006，以及 Leo Strauss, “Pourquoi nous restons juifs: la foi et l’histoire juive peuvent-elles encore nous parler?”，载 *Pourquoi nous restons juifs: Révélation biblique et philosophie*, trad. par Oliveir Sedyen, Paris, La table ronde, 第 13-57 页, 2001。



行的,阿伦特没有太重要的弟子或传人,而施特劳斯桃李满天下,甚至出现了“施特劳斯学派”这样的词;法国知识分子圈对二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二人流亡美国之前:阿伦特在1933年到1941之间一直生活在巴黎,她通过雷蒙·阿隆的关系参加了科耶夫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开办的黑格尔研讨班,课程笔记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黑格尔导读》,在课上虽然她与萨特并无过多来往,但是却与科瓦雷(Koyré)成为挚友<sup>[1]</sup>,施特劳斯借助洛克菲勒奖学金只在法国停留过一年<sup>[2]</sup>,但与雷蒙·阿隆、科耶夫等人成为学术上非常好的朋友,并且互相影响;两人的思想很早被引入法国并且还一直被借鉴,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就由法国Plon出版社出版了法译本,此后对施特劳斯思想的讨论一直不断<sup>[3]</sup>;也是在1954年,雷蒙·阿隆在《批评》(*Critiqu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阿伦特眼中的极权主义本质”的文章,1961年法文版《人的条件》问世,但是直到70年代末,法国对于阿伦特第一阶段的阅读始终围绕着极权

---

[1]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Biographie*, 前揭,第149-150页。

[2] 1932年。

[3] 从雷蒙·阿隆、伊冯·贝拉瓦尔(Yvon Belaval)到吕克·费里(Luc Ferry)、阿兰·勒诺(Alain Renaut),再到雷米·布拉格(Rémi Brague)、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都写过关于施特劳斯思想的文章,著述中也都提到过施特劳斯思想的重要性,但是直到20世纪末,法语学界中Daniel Taguay才第一次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对施特劳斯的整个思想进行诠释。他的侧重点在于施特劳斯的政治-神学问题,论文在阿兰·勒诺的指导下于1997年答辩,2003年出版,见Daniel Tanguay,《施特劳斯:一部思想传记》(*Leo Strauss: un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Paris, Grasset, 2003。之后,Corine Pelluchon在雷米·布拉格的指导下,博士论文重点讨论了施特劳斯以中世纪启蒙反现代启蒙的问题,见Corine Pelluchon,《列奥·施特劳斯:另一种理性,另一种启蒙》(*Leo Strauss: Une autre raison, d'autres Lumières*), 前揭。

主义这一主题<sup>[1]</sup>。

作者将这场对话地点设在我们这个充满危机的世界。面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我们如何生活下去、如何去思考政治,并且人作为有记忆但却会遗忘的动物,怎样使人对于当下的感觉成为个人意识中必不可缺的要素,这是作者希望通过这次对话所想要得到的答案。通过比较的方法去梳理阿伦特与施特劳斯的文本,作者为我们理清了二人思想上所对立的那一部分,另一方面也邀请诸位读者去判断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去栖居于危机之中。在这篇译序中,我希望借助本书的脉络能够继续延伸、补充这样的对话,讨论施特劳斯与阿伦特思想的同时使我们更可以看清他们各自哲学的最终目的(*telos*)以及这种目的背后他们各自政治哲学最重要的支撑点。

## 二

在现代语境下,危机(*crise*)意味着一种危险,一种现有状态的即将被改变的临界点。但是如果从词源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危机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危机(*crise*)与批判、批评(*critiquer*)都来源于希腊语“*krinén*”,表示进行决定性地判断,具有检验、分离的意思。在这种意义上,危机不过是判断后的一种危急后果。维德马耶尔由此借助于施特劳斯与阿伦特的文本,认为危机不仅是可以被思考的,而

---

[1] 关于法国思想界对阿伦特思想的讨论的三个阶段,参见 Olivier Mongin 为 1988 年 4 月 14 日到 4 月 16 日举行的“阿伦特,政治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所撰写的导读——“阿伦特在法国的接受”(“*La réception d'Arendt en France*”,载 *Politique et Pensée, colloque Hannah Arendt*, Paris, Edition Payot & Rivages, 1996, 第 7-14 页。第一版, *Ontologie et Politique. Hannah Arendt*. Paris, Tierce, 1989)。

且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我们所在的世界。

施特劳斯与阿伦特都认为我们处于危机之中,而施特劳斯所诠释的危机是整个西方世界理性、思想的危机<sup>[1]</sup>。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正是诞生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对传统政治哲学的彻底抛弃,自此之后现代性内部便出现了危机,所以 20 世纪以来发生的诸多事件并不是施特劳斯所首要思考的<sup>[2]</sup>。这样的观点与胡塞尔的类似,即“危机是方法的困境”<sup>[3]</sup>,胡塞尔认为“欧洲的危机植根于一种理性主义的错误之中”<sup>[4]</sup>。同施特劳斯一样,阿伦特也在试图去诊断危机,但是阿伦特强调的是现实政治的危机,危机是揭示现实的时刻,而由事件所引发的危机影响人所触及的各个领域,比如:文化、工作以及教育,这样的危机促使我们去思考现实。这样来看,二人对于危机定义的解读就已经存在着分歧了。阿伦特的危机是一种关于现象

[1] 施特劳斯对危机的阐述有三个指向:一个是现代性危机(现代性所经历的三个浪潮,从马基雅维利到尼采,中间经过卢梭),第二个是西方思想的危机(不同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第三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最后一个方向看似平庸无奇,但是在施特劳斯的思想背景中却让我们注意到我们作为现代人所生活的时代与在自然运行中的时间之间的差距。

陈建洪在《论施特劳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中将施特劳斯放入乌托邦的传统中去思考,这就意味着施特劳斯对于危机的认识是理论性的,而且他对西方未来的不确定性忧心忡忡,见 Leo Strauss, *La cité et l'homme*, trad. par Olivier Sedeyn,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 Française, “introduction”, 第 63-83 页,以及“La crise de notre temps”,载 Leo Strauss, *Nihilisme et politique*, trad. par Olivier Sedeyn, Paris, Payot & Rivages, 2004, 第 81-115 页。

[2] 对施特劳斯来说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衰落要比极权主义在德国的兴起重要得多,而就是这样的事件(événement)在施特劳斯看来,只是揭示了危机。

[3] E. Husserl, *La crise des sciences européennes et la philosophie transcendantale*, « Compléments: Annexes », trad. par G. Granel, Paris, Gallimard, 1962, p. 380-381.

[4] 同上,第 371 页。

性的危机,在特定现实中是一种危急的时刻,这也体现了阿伦特特有的思考方法<sup>[1]</sup>;而施特劳斯眼中的危机根源并不处于我们生活的当下,危机一直都有,不仅现代性内部有危机,甚至整个现代性在施特劳斯看来就是一场危机。

无论这场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教育都首当其冲,并且二人也都看到了教育在现代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危险。阿伦特将矛头直接对准二战以后在美国流行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而阿伦特对教育的反思不是仅仅停留在教育本身上,而是把教育危机归入到整个的政治危机中<sup>[2]</sup>;施特劳斯虽然没有点出实用主义之弊端,但在他的思想中,教育是哲人必不可少的工作<sup>[3]</sup>,而在他的书写艺术中教育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们感觉对于永恒的紧迫问题以及典型的政治问题,教育是唯一的回答,并且这样的回答可以知道如何去调和一种不是压迫的秩序与一种不是放任的自由<sup>[4]</sup>。”他们都把教育看作是政治哲学的一部分,但是在具体的方式上却存在着许多分歧。

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树立哲学的地位,如何把对真理的追求作为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一直是深处现代民众社会之中的施特劳斯在面对众多的“言论”(opinion)时所产生出的疑问。为此施特劳

---

[1] Ernst Vollrath, “Hannah Arendt and the Method of Political Thinking”, *Social Research*, number 44, 1977, p. 163-164, 转引自 Roland Beiner, “Hannah Arendt et la faculté de juger”, 载 Hannah Arendt, *Juger: sur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de Kant*, trad. par Myriam Revault d'Allonnes, Paris, Seuil, 1991, 第160页。

[2] 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处于危机中的教育”。

[3] 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哲人,在广场之中寻找潜在的哲人。

[4] Leo Strauss, “La persécution et l'art d'écrire”, in *La persécution et l'art d'écrire*, trad. par Olivier Sedeyn, Paris, Éditions d'éclat, p. 69.

斯提出了“自由教育”。需要注意的是,施特劳斯并不是想要用回归古典、回归古人的方法去替代现代民主社会,他所构想的是如何能让一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存在于大众文化(即民主)之中<sup>[1]</sup>。所以仅从施特劳斯自由教育的初衷,我们还不能断定这就是一种精英教育。从施特劳斯自由教育的形式上来说,就是由老师带领学生精细地阅读古代的经典文本与前人留下的丰厚思想遗产<sup>[2]</sup>。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只是一个中介去推荐文本,引导、帮助学生们去阅读,“老师也是学生,而且必须是学生”<sup>[3]</sup>。这样阅读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学生无条件地接受前人的想法,或是不加以思考地就认为古人的思想是伟大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古人的众多文本之间有太多的分歧与不同,甚至是矛盾<sup>[4]</sup>,所以才要让当下的学生们去不断地思考谁更有道理、谁的论据更有力,由此与古人沿着同样的路去追问真理。而这种阅读式思考,也正是让现代人有了在不同的言论之间、观点之间自由选择的可能性<sup>[5]</sup>。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获取真理的方式并不是要将真理、知识完全与意见(*doxa*)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寻求真理的过程本身就会出现许多的疑惑、不确定性,有时候意见并不是一无是

---

[1] Leo Strauss, “Qu’est-ce que l’éducation libérale?” (1961), in *Le libéralisme antique et moderne*, trad. par Olivier Sedeyn, Paris, PUF, 1990, p. 16.

[2] 同上,第13页。将阅读文本作为特定的教学内容,施特劳斯沿用了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法,参见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vol. 1, Paris, Seuil, 第113-114页,以及 Jean-Philippe Genet, *La mutation de l’éducation et de la culture médiévale*, tome 2, Paris, Seli Arslan, 第379-381页。

[3] Leo Strauss, “Qu’est-ce que l’éducation libérale?”, 前揭,第13页。另外,老师教学中的中介作用在中世纪大学中也是很常见的,而且老师与学生的区别也不是十分明显,参见 Jean-Philippe Genet, tome 1, 同上,第225页。

[4] Leo Strauss, “Qu’est-ce que l’éducation libérale?”, 前揭,第18页。

[5] Leo Strauss, “La persécution et l’art d’écrire”, 前揭,第52页。

处,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就说明了这一点:“无视人们关于事物的意见,就等于抛弃了我们通往现实最重要的通道……对于一切意见的‘普遍怀疑’不是引领我们到达真理的核心,而是一片虚空。哲学沉思就是由意见升华到知识或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由意见所指引的<sup>[1]</sup>。”同样,细读古人文本的做法意味着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是一种为了“传承”的教育,与阿伦特的那种为了“开端”的教育完全不同:“文盲的社会不可能严格施行最古老即最好的原则,只有祖宗留下的文字才能让后代直接与他们沟通<sup>[2]</sup>。”

从另一侧面来看,施特劳斯并不是把自由教育构想为一种教育形式上的自由。显然,教育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出知识与意义,所以在教育中过分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只会将个体封闭起来<sup>[3]</sup>,真理的产生与对理性的合理运用必定要通过哲学式的阅读来实现。而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在施特劳斯看来,也是建立在细读文本进而寻求真理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不会轻易地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sup>[4]</sup>,并且能够在众多的言论之中“学会听取细微的声音<sup>[5]</sup>”。

与施特劳斯不同,阿伦特思想方法的独特性在于,她可以将每个

[1] Leo Strauss, *Droit naturel et Histoire*, trad. par Monique Nathan et Eric de Dampierre, Paris, Plon, 1954, Paris, Falmarion, 1986, p. 118.

[2] Leo Strauss, “Qu’est-ce que l’éducation libérale?”, 前揭,第17页。

[3] 当下许多新颖的启发式教育方法就受到了学者的质疑,见 Olivier Rey, *Une folle solitude: le fantasme de l’homme autoconstruit*, Paris, Seuil, 2006。

[4] 施特劳斯在课上对学生提问的作答,转引自 Catherine Zuckert,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History”, 载 Rafael Major (ed), *Leo Strauss’s Defense of the Philosophic Life: Reading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第62页。

[5] Leo Strauss, “L’éducation libérale et la responsabilité”, in *Le libéralisme antique et moderne*, trad. par Olivier Sedeyn, Paris, PUF, 1990, p. 45.

由事件所产生出的经验,通过自苏格拉底时期以来就开始演变的诸多哲学基本概念加以分析,有时候这样的方法显得反潮流,因为她常常对许多当下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不合时宜的思考。阿伦特对教育危机的思考就是一个例子。

20世纪60年代中叶,美国实用主义、进步主义教育的弊端不断爆发出来,不管是起初的民权争论还是后来的校园骚乱,阿伦特认为这是当下的教育危机对现代性的诸多不确定性的反应。诚然,阿伦特并不是教育学的专家,她只是依据现实将教育方面的问题融入到了她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之中。在阿伦特看来,现代人在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缺乏一种中介即判断(jugement),而判断力的缺失也就导致了世界多样性的消失,最后这个我们群体生存的世界必然开始异化。在阿伦特的教育理念中,依然体现着其哲学的三个时间维度,即过去、现在和将来。教育始终贯穿着这三个维度,并且现实之中的教育是连接过去与将来的一条纽带,可是恰恰是这条纽带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问题。

教育的本质在阿伦特的文本中是诞生性<sup>[1]</sup>,博士论文研究奥古斯丁的阿伦特用诞生性去诠释教育并不让人感到吃惊<sup>[2]</sup>,因为诞生性使创造新事物成为可能。在这里,阿伦特并不是主张任意地去创造,不加限制地让新事物涌现。恰恰相反,阿伦特所期待的“新世界”,必须要以旧的世界作为参考,只有这样新世界才有意义<sup>[3]</sup>。如何从旧世界中来,再到新世界中去,阿伦特所引入的“权威”概念就

---

[1] Hannah Arendt, “La crise de l'éducation”, trad. par Chantal Vezin, in *La crise de la culture*, Paris, Gallimard, 1972, p. 224.

[2] Hannah Arendt, *Le concept d'amour chez Augustin: essai d'interprétation philosophique*, trad. par Anne-Sophie Astrup, Paris, Deux-temps Tierce, 1991.

[3] Hannah Arendt, “La crise de l'éducation”, 前揭,第229页。

显得尤为重要了<sup>[1]</sup>。从词源上来看,权威的拉丁语为 *auctoritas*,它来自拉丁语增加、提高即 *augere* 一词,同样,“作者”*auctor* 也是衍生于它,拉丁语即为奠基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权威的本意即在于在没有劝说或武力的情况下,我们所要服从的一种外在的力量。无论是在古罗马的历史语境之中<sup>[2]</sup>,还是当代学者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所讨论的那样<sup>[3]</sup>,权威都体现为统治以及权力的合法性。而阿伦特恰恰是去除权威的统治或压迫的含义,她所要强调的是以暴力、震慑为形式的权力(*pouvoir*)通过历史、时间潜移默化地提升最终演变成了无形的权威。换言之,权威一定有它的历史来源,它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sup>[4]</sup>。一旦权威消失,权威出现了危机,那么它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 20 世纪极权主义的诞生。但是,教育为何因权威的消失而出现了危机呢?阿伦特认为,人的出生只是生物现象(*bios*),而人是生活在世界之中的人,所以孩子需要被引入世界,从家庭这个私人空间进入到公共空间即世界,而学校恰恰就是介于这两种空间之中的一个通道,而它绝不是孩子们所要进入的世界<sup>[5]</sup>。学校的功能就是要将旧世界展现给孩子们、把传统的知识传递给他们(过去),老师在授业解惑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权威一定是建立在对世界的责任之上的<sup>[6]</sup>(现在),最终权威是将旧世界抬升、

---

[1] Hannah Arendt, “Qu’est-ce que l’autorité?”, trad. par Marie-Claude Brossollet et Héléne Pons, in *La crise de la culture*, Paris, Gallimard, 1972, p. 121-185.

[2] Cicéron, *Traité des loi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51, III, 28; Pierre Grimal, *La civilisation romaine* (1960), Paris, Champs Flammarion, 2002, p. 112.

[3] Max Weber, *Economie et société*, Paris, Plon, 1971, p. 95-96.

[4] Hannah Arendt, “Qu’est-ce que l’autorité?”, 前揭,第 126 页。

[5] Hannah Arendt, “La crise de l’éducation”, 前揭,第 242 页。

[6] 同上,第 243 页。



加深、升华,让孩子们进入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世界(未来)。而教育在当下出现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人们不去履行对世界的责任,只是一味地将过去的东西以一种知识的形式灌输给孩子们,教会他们许多生活的技能<sup>[1]</sup>,致使他们过早地进入了成人的世界。

阿伦特与施特劳斯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她在教育中强调老师与学生位阶的不同,即老师是权威,权威所具有的责任是为世界培养公民,而这些未来公民所开创的世界要与当下的世界有所不同,会有新事物出现;第二,在教学内容上来看,阿伦特并没有过多的讨论,因为她的着重点在于教育方法,但是她对回归古人是不赞同的,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种重复<sup>[2]</sup>,她只是把古人的经典看成是一种参考,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什么<sup>[3]</sup>;最后,相比较于施特劳斯的教育理念,阿伦特试图将教育与政治生活相分离<sup>[4]</sup>,但并没有放弃对未来公民思想上进行教育(*éduquer*)的意图(而不是简单地教, *enseigner*),只不过个人思想上的自由选择被定格在了未来的维度,而当下或现在的教育旨在“保存”孩子们的新颖性以及“保护”孩子们使其不要在世界中成为小大人<sup>[5]</sup>。

### 三

从苏格拉底开始,“教育”(*paideia*)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一

---

[1] Hannah Arendt, “La crise de l'éducation”, 前揭, 第 251 页。

[2] 同上, 第 249 页。

[3] 同上, 第 250 页。

[4] 同上。

[5] 同上, 第 246 页。